

【理论与方法】

【原刊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帝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并出现复兴趋势。在西方史学界,复兴中的帝国史研究在新社会史、后殖民理论、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的影响下,一反过去主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维度来解释帝国的传统,开始从文化视角关注种族、性别、权力话语、身份认同、流动网络等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新帝国史”。如何认识近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帝国史研究的这种新变化?又如何评价西方帝国史研究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约请了几位学者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帝国史研究及其影响的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将帝国史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陷阱。

西方帝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刘文明 李友东 魏孝稷

【作者简介】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孝稷,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20.3.4~23

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

刘文明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7)的阶段性成果。

一般认为,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1883年约翰·罗伯特·西利(J. R. Seeley)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的诞生。1953年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发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对帝国史研究视角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正。在20世纪50-7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浪潮的影响下,帝国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走向衰落并逐渐为“区域研究”所取代。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帝国史研究出现了复兴,并在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帝国史书写的“新帝国史”。

全球化和全球史作为影响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不仅推动了帝国史的复兴,而且促使帝国史研究出现了“全球转向”,全球史理论和方法在帝国史中的运用成为“新帝国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将从“新帝国史”的兴起谈起,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复兴及“新帝国史”研究做初步的考察。

一、帝国史的复兴与“新帝国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殖民帝国的瓦解,“帝国”和“帝国主义”在这股大潮中成为批评对象,人们通常把研究帝国史看成认同或同情帝国主义。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帝国史陆续从欧美大学的教学甚至研究机构中去除,代之而起的是“区域研究”或“第三世界研究”,也有一些帝国史家转向原宗主国历史的研究。这样,作为整体的帝国史基本上分解成了两个领域。即原宗主国的历史和原殖民地新兴国家的历史,帝国史为民族国家史的潮流所淹没。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史在欧美史

学界开始出现复兴,“帝国”一词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相关的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帝国史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且开始摆脱传统帝国史的研究视角和书写方式而出现了“新帝国史”。

何谓“新帝国史”?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从学术史来看,最初提出“新帝国史”概念的学者都有英帝国史的学术背景,因此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传统英帝国史而言的。但是,后来有一些学者将“新帝国史”概念用于法国、西班牙、德国的殖民帝国,也有少数学者将之用于欧洲之外的“帝国”。

“新帝国史”是相对于传统帝国史而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帝国史的特点作一简要回顾。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上把帝国史看作宗主国的扩张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以宗主国为中心展开,关注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欧洲国家扩张的原因和动机,主要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来分析;二是帝国建立的过程,主要包括欧洲的探险者、航海者、传教士、殖民公司、移民等“发现”和“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三是帝国的统治和组织,包括殖民地政府的组织、宗主国制度和法律扩展到殖民地等;四是帝国的成本和收益,即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给宗主国和宗主国各阶层带来了什么。^①因此,这种以宗主国为中心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帝国史书写,完全把殖民地及其人民置于被动、次要和附属的角色,同时也忽视了文化、性别、种族等其他因素。

凯瑟琳·威尔逊在其主编的《新帝国史:1660-1840年不列颠及其帝国中的文化、认同和现代性》(2004年)中,收录了属于“新帝国史”范畴的16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帝国内部的差异、文化、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是“新帝国史”的重要概念。后来她进一步解释了“新帝国史”,认为它是由历史研究和批判实践构成的一种跨学科形式,采用了女权主义、文学、后殖民和非西方的视角,并利用当地知识来重新

评估权力与维持现代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历史研究不仅仅关注社会底层,也反思西方观念下长期忽视下层及非西方群体的学科规则和范式,并对其干预,目的在于从概念上重新思考帝国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一途径来重构关于帝国的叙事。^②斯蒂芬·豪在其主编的《新帝国史读本》(2010年)中也对“新帝国史”概念做了探讨。他认为,尽管学者们对“新帝国史”有不同界定,但可以找到其间共同的内涵:“他们意指以文化和话语的观念为中心的帝国史研究取径,极为关注性别关系和种族想象,强调殖民主义文化对宗主国及被殖民者的影响,并倾向于进一步探讨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后的持续影响。他们对知识、身份认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包括关于历史学家自身定位的一种高度明确的自我意识,提出问题或假设。”^③杜尔巴·高希认为,“新帝国史”是“对旧帝国史的一种修正,关注点在于文化、性别和种族,而不是高端政治、经济或军事扩张”。^④这一表述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新旧帝国史的区别。不过,上述学者对“新帝国史”的理解,更多地表现出“文化转向”而非“全球转向”的思考视角。因此,帝国史的“全球转向”及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帝国史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复兴并发展出“新帝国史”?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界所处的社会和学术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它是在各种新学术思潮影响下整个史学变革中的一部分。这些新学术思潮包括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和庶民研究、女权主义与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它们为帝国史焕发出新的活力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由于本文关注点和主题在于“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因此,关于上述其他思潮对帝国史的影响不作探讨。

历史学的“全球转向”也像“文化转向”一样对帝国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催生“新帝国史”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唤起帝国史复兴的现实基础,而全球史的发展则为新帝国

史的兴起提供了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借鉴。首先,20世纪末的全球化趋势,意味着人口、商品、资本、信息的快速全球流动,意味着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相关问题会暴露出视野上的局限性。例如,如何理解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跨国“流散社群”?如何理解日益相互依赖的跨区域贸易关系?如何实现大范围不同民族和谐共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这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在力图从全球史视角做回答的同时,也想到了昔日的帝国。克里尚·库马尔指出:“帝国至少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又重新受到青睐,因为它以一种实用的方式重现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许多特性。……帝国可以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当代世界的许多紧迫问题——甚至是一个新世界秩序诞生的阵痛。无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似乎都会遇到在历史上的帝国中有先例可循的问题和情况。”^⑤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帝国史这种以史鉴今的功用,是帝国史复兴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

其次,帝国扩张和帝国主义行为是理解历史上全球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帝国由此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欧洲扩张,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85%的领土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帝国的控制之下。而与这一进程相一致的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口、货物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流通,这些反过来也在帝国的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从历史学视角看,要理解和分析这种全球化进程,就需要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框架。这样,帝国由于其空间上的跨区域性和政治上的多民族性、经济上的区域一体化、文化上的多元共存,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者探讨区域史或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A.G.霍普金斯说:“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民族国家这个层次以下或以上的问题。……后殖民时代的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三个世纪中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的遗产,如果不承认

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⑥

再次,对帝国史学者来说,全球史为帝国史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和方法。例如,全球史学者把欧洲帝国扩张置于全球情境中来理解,认为帝国的扩张不仅是帝国实力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欧洲之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推动了欧洲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全球史研究中的网络分析也成为帝国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把帝国看作一个由宗主国和各殖民地构成的联系网络,而且它与相关外部世界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整体,通过考察帝国网络来理解帝国本土和各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避免了以往帝国史研究中简单地从宗主国与殖民地、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模式来理解帝国。

由上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史得到复兴并发展出“新帝国史”,虽是各种社会和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但全球化和全球史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

阿西娜·赛利亚图在回顾英帝国史研究的学术史之后,曾对帝国史发展的新动向做了如下概括:“历史学行业的新动向,在帝国主义研究中找到了一方沃土。其间,混杂身份得以考察,文化因素得到优先关注,以揭示自帝国建设伊始出现的底层歧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相关研究主题涵盖丰富,包括全球性、地方性、网络以及宗主国与帝国之间私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的流动性等,展现了一个宽泛的知识光谱,这一知识光谱既涉及帝国经历,又涵盖历史方法论。”^⑦这一概括反映了帝国史研究在“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影响下出现的新特点:“新帝国史”既是从文化、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流动、全球性、网络等视角来研究帝国史的新领域,也是从这些概念出发来研究帝国史的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转向”影响下的帝国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关联、互动和整体的视角把帝国置于

一个更大的全球化背景下来理解。整体观和互动观是全球史研究最基本的视角,全球史学家把帝国这一历史现象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情境中,在不忽视帝国扩张内在动力的同时,注重从帝国与外界的互动来理解其兴衰。例如,C.A.贝利的《帝国子午线:1780-1830年的英帝国与世界》(1989年)在分析英帝国的扩张时,将亚洲与英国作为一个相关的整体来看待,认为英帝国的建立正是以莫卧儿、萨法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为前提的。因此,贝利提出:“1780年至1830年间不列颠的新帝国,只有在同时考虑了大不列颠的社会变化和殖民地或其周围准独立(quasi-independent)国家的发展后,才能被理解。……最重要的是,英帝国不仅必须被视为美洲、亚洲或非洲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相位(phase),而且也必须被视为英国民族主义本身产生的关键相位。”^⑧P.J. 该隐和A.G. 霍普金斯合著的《英帝国主义》(初版于1993年)也将英帝国主义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中来研究,认为“帝国是全球化的力量,它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出其自身领土的边界。帝国扩张的全球化后果遍及世界并持续影响到去殖民化时期”。^⑨他们提出,“绅士资本主义”是英国不断对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该书把绅士资本家、英国本土、英帝国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从经济利益驱动和大范围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英帝国的兴衰,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称这一思路是“把帝国史视为一种通向连贯的全球史视野的路径”。^⑩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不列颠的全球扩张》(2012年)中声称:“英国的扩张史是英帝国与其他地区经历的一系列遭遇的历史,以接触交流为始,以建立殖民社会为终,这就是帝国的构建过程。”^⑪因此,他把英帝国的扩张放在全球情境中,看作英国与外界相遇、接触、占领和统治的过程。

第二,从宏观历史比较的视角对帝国史进行研究。比较方法在帝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早已有之,例如艾森斯塔得的《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年)、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1986年)。随着全球史的兴起,

宏观历史比较方法得到发展,以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表的一些著作表明,全球史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对于“新帝国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多米尼克·列文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将俄罗斯帝国史置于广阔的国际情境中与其他帝国进行比较,尤其是与竞争对手英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进行比较,包括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人口、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来衡量各国的强弱,由此来探讨俄罗斯帝国的兴衰。^⑫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中声称:“我们探究的是不同帝国运转的多种方式,并观察它们经历岁月置身种种境况中所做出的无数努力的程度与局限性。”^⑬因此,他们将古代罗马和汉朝以来世界上主要帝国的历史,在比较视野下从帝国统治的政治差异、中间人、政治想象、权力武库、扩张动力等方面探讨了各个帝国不同的特征。克里尚·库马尔的《帝国愿景:五个帝国政权如何塑造世界》也主要采用比较方法探讨了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不列颠和法兰西帝国,目的是“通过比较一群不同的帝国来揭示它们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的共同特征——尤其是统治民族的身份认同,他们是如何从其在帝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中获得自我意识的”。^⑭

第三,从网络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帝国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全球史学者在考察全球化的发展时,往往把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理解作为一种网络化的发展,麦克尼尔父子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描绘了一幅人类历史网络化的图景。在“全球转向”背景下,网络成为理解帝国史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托尼·巴兰坦指出:“帝国不仅由连接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诸多网络和交流组成,而且其结构本身也依赖于各殖民地之间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横向联系。”^⑮“网络的隐喻也让我们注意到殖民地之间至关重要但通常被忽视的横向联系。英帝国就像一张蜘蛛网,依赖于殖民地间的交流。”^⑯因此,艾伦·莱斯特在《帝国网络:在19世纪

南非和英国建立身份认同》中,通过考察19世纪英国对南非东开普殖民地的统治,从帝国网络和殖民主义话语构建的角度,探讨了英国殖民者的身份认同。他认为,南非英国人的相关殖民话语及其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在东开普殖民地,而是在一个把各个殖民地及宗主国连接起来的网络中形成的。“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帝国每一个场所都连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帝国危机时期,人们思考构建科萨人的殖民表征,是根据澳大利亚殖民者对土著人的形象、新西兰殖民者对毛利人的描绘、印度官员的‘印度’观念、西印度种植园主对前奴隶的描绘,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及其他国内‘庶民’群体的看法。就大多数殖民地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与帝国从属民族的相互认知,本身就有助于产生一种作为英国流散社群的集体意识。”^⑩托尼·巴兰坦的《东方主义与种族:英帝国中的雅利安主义》也从帝国网络视角探讨了雅利安主义的出现及其在英帝国各地的传播。他说:“本研究不再局限于关注一个民族或文明,而是将大英帝国视为一个‘关系束’(bundle of relationships),它通过流动和交换体系将不同的区域、社群和个人联系起来。”^⑪此外,在佐伊·莱德劳(Zoë Laidlaw)的《殖民联系(1815-1845年):资助、信息革命和殖民政府》(2005年)、凯瑞·沃德(Kerry Ward)的《帝国的网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2009年)、盖里·麦基(Gary B. Magee)和安德鲁·汤普森(Andrew S. Thompson)主编的《帝国与全球化:不列颠世界中人员、商品和资本的网络(1850-1914年)》(2010年)等著作中,网络分析都成为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工具。

第四,从关联、互动的视角将个人生活经历置于帝国框架中来书写,即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书写个体的微观路径相结合。这种帝国史研究往往以个人传记为基础,将个体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置于帝国这个宏大背景下来理解和分析。例如,琳达·科莉在《俘虏:1600-1850年的不列颠、帝国和世界》一书中试图“通过被俘的个人及其故事来考察和重新评估

更广泛的国家、帝国和全球的历史”,^⑫因此,她通过对北非和地中海、北美大陆、南亚和中亚三个区域中被俘的英国人的描述,“将大规模、全景和全球的历史与小规模、个体和特定的历史结合起来”,^⑬寻求宏观史与微观史的结合。这种通过书写小人物来反映大帝国的方法,在她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历史中的一位妇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该书以生活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妇女伊丽莎白·马什的艰辛经历为中心,讲述了三个层面的故事。首先是关于伊丽莎白的一生,她的足迹遍及欧非美亚四大洲。其次讲述了她的大家族成员,他们在促成伊丽莎白大范围流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伊丽莎白生活在一个全球联系增强而又动荡的时期,这种全球局势塑造和扭曲了她的人生历程。“所以,本书描绘了一个生活中的世界和一个世界中的生活。这也是为何要改造和重新评价传记,把传记作为加深我们对全球史理解的一种途径。”^⑭因此,科莉在该书中,通过把伊丽莎白个人命运与当时的英帝国及全球化联系起来,“试图在个人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转换,以便使它们同时出现”。^⑮艾玛·罗斯柴尔德的《帝国的内在生活:18世纪史》也是以小见大的帝国史杰作,该书以苏格兰约翰斯通家族的四姐妹七兄弟为中心讲述了一段18世纪的英帝国史。约翰斯通家族的成员及其奴仆的活动空间范围极广,足迹遍及不列颠、法国、西班牙、印度等地。因此,艾玛说:“在现代晚期的微观史研究中,新的可能性是通过个体自身的联系史,把微观史和宏观史联系起来。我试图在约翰斯通家族的故事中探索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开始,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相遇,最后到一个帝国的或启蒙的或思想的更大社会的历史。”^⑯克莱尔·安德森的《庶民生活:1790-1920年印度洋世界中的殖民主义传记》,“探讨了19世纪与印度洋刑罚殖民地有关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片段。它从庶民史的角度审视了殖民主义,并将罪犯流放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情境之中”,^⑰也体现了

一种见微知著的帝国史。

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及学术思潮的兴起,在“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这两大潮流影响下,帝国史在复兴过程中出现了“新帝国史”。“文化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关注文化、性别、种族和身份认同,而“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则更注重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强调互动、关联、流动和网络在理解帝国中的作用,并且把“庶民”的日常生活置于宏观帝国框架和网络中来理解,形成了将个人微观史与全球宏观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新尝试。可以说,“新帝国史”这些特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帝国史过分注重政治、经济和军事并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反思和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民族国家史视角下帝国史研究中的不足。

“新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在英帝国史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关的概念和方法理应限于分析英帝国,充其量可移植于分析具有相似特征的欧洲殖民帝国。然而,由于“帝国”概念的滥用,^⑤少数西方学者也将“新帝国史”相关概念和方法运用于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伪”帝国史,由此妨碍了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并具有自身学术传统的帝国史的发展。因为,当“帝国”概念脱离它产生的历史情境而广泛用于指称世界历史上的大国时,这一概念便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概念借用基础上的“帝国史”或者说由此衍生出来的“伪”帝国史,便会对本原意义的“帝国史”造成干扰,甚至瓦解“帝国史”作为一个历史学专门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学术合理性。

注释:

①David K. Fieldhouse, "Can Humpty-Dumpty Be Put 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12, No.2, 1984, pp.9-23.

② Kathleen Wilson, "Old Imperialisms and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95, 2006, pp.211-234.

③ Stephen Howe,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Routledge, 2010, p.2.

④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7, Issue 3, 2012, pp.772-793.

⑤ 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

⑥ A. G. Hopkins, "Back to the Future: From National History to Imperial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164, 1999, pp.198-243.

⑦ 阿西娜·赛利亚图:《民族的、帝国的、殖民的和政治的:英帝国史及其流裔》,《全球史评论》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⑧ C. A.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gman, 1989, p.15.

⑨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15*, 3rd edition, Routledge, 2016, p.705.

⑩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20世纪的帝国史研究谱系》,《全球史评论》第10辑,第6页。

⑪ 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冯宇、任思思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⑫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John Murray, 2000.

⑬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页。

⑭ 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xii.

⑮ Tony Ballantyne, "Rereading the Archive and Opening Up the Nation-State: Colonial Knowledge in South Asia(and Beyond)", in Antoinette Burton, ed.,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2.

⑯ Tony Ballantyne, *Orientalism and Race: Aryan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15.

⑰ Alan Lester, *Imperial Networks: Creating Ident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Africa and Britain*, Routledge, 2001, p.189.

⑱ Tony Ballantyne, *Orientalism and Race: Aryan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p.1.

⑲ Linda Colley, *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Pantheon Books, 2002, p.12.

② Linda Colley, *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p.17.

③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Pantheon Books, 2007, p.xix.

④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p.xxxi.

⑤ Emma Rothschild, *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

⑥ Clare Anderson, *Subaltern Lives: Biographies of Colonialism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1790–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

⑦ 学术界关于“帝国”概念的讨论,参见刘文明《“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全球史评论》第1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

——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

李友东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相对忽视对“国家”与“帝国”的研究。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识到“社会”无法脱离“帝国”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影响;^①同时随着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学派对于“帝国”的关注,世界历史领域中出现了“帝国转向”,“历史中国”的叙事也发生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概念自身就具有一种“荒唐的杂乱现象”。^②故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范式的转移加以认识。

一、“帝国”概念的跨语际反思

所谓概念,指的是对某一类具有共同特征事物的概括。逻辑上,可以将概念分为内涵和外延两部分。内涵指的是概念蕴含的意义与属性,而外延则是指根据这种意义与属性,可以划归于概念的经验案例。这种对概念的逻辑分析,若放置到跨语际实

践中来考察,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以“帝国–empire”这样的跨语际对译概念为例,中西方不同的概念属性及其意涵,是如何在彼此之间历时性地建立等值关系的?怎么能够相互理解?其语际相互作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思考范式?“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了。”^③

就古汉语“帝国”的本意来讲,其原本是指皇帝所居住的都城,如宋代周邦彦在《看花回》词之二中有“雪飞帝国,人在云边心暗折”之句,这里的“帝国”指的是“京都”。“帝国”内涵的变化,最初与中国清末的外交实践有关。1890年,清政府使节薛福成率领外交使团到达欧洲,他基于中国的实际经验,将“帝国”理解为“有皇帝的大国”。“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引者注:即empire的音译),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但薛福成也注意到这种“王国”的独特之处,英伦国主的“君权”在本国国土内,因为“以数百年来为其民所限制,骤难更张也”;但在它所拥有的印度殖民地那里,却可以“君权较重”。^④严复在翻译“empire”(1901–1902年)时,用的是音译词“英拜儿”,但旁边又加注释解释道:“近人译帝国”。^⑤严复所指“帝国”与“empire”对译的做法,究竟是最初见于教会汉语的译法,还是经日语而进入汉语,现在还搞不清楚。但“帝国”从一个古汉语复合词,经过复杂转化,用于翻译欧洲相应概念后,其基本义已发生改变,则毋庸置疑。

就《现代汉语词典》的“帝国”定义来说,“一般指版图很大或有殖民地的君主国家,如罗马帝国、英帝国。没有帝王而向外扩张的国家,有时也称为帝国,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叫第三帝国”。这个释义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义(“一般指……”)是薛福成式的、基于“君主”理解帝国的思路;而次要义(“有时也称……”)兼顾“没有帝王却扩张”理解帝国的思路。但更需注意的是,在“帝国”概念的具体举例中,并无一个与中国有关,其非常明确地是指中国以外的世界古今帝国,并未列举任何与“中华帝国”或与中国

朝代有关的如“秦帝国”“汉帝国”事例。从《现代汉语词典》历次版本对“帝国”词条释义与举例的坚持来看，^⑥这并非偶尔为之，而是有着深刻考量的。

英语中“empire”的常见释义与汉语“帝国”存在很大不同。英文 empire，来自拉丁语的 imperium，具有“命令、统治、支配”之意，它又衍生出古法语的 empire，后使用于现在的法语及英语中。法语的 empire，“是一个即便皇帝不存在亦可行的概念”，英、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近世新兴国家，“本来就是拥有海外领土才成为‘帝国’的”。也因此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英语词典将“empire”多解释为：1.“由单一个人、政府或者国家统治的一组国家”；2.“一个像帝国一样被统治的公司或者组织”。^⑧两相比较，中英文“帝国”的语义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在中文语境下，其基本义侧重于指“有君主”（“帝”）的版图较大或有殖民地的国家；而在英文语境下，其基本义则侧重于强调“empire”乃是指对一组国家的统治，有无“帝”并不重要。

除去这种一般性的中西方对“帝国”的解释外，还有多种对“帝国”的学术解释。在不同学术语境下，帝国的类型可以划分出几十种之多。例如，如依照结构、形态来分，可分为十种不同的帝国意涵；按照规模，则可分为五种帝国类型；按照区域分，则可分为八种。^⑨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实际来看，“帝国”的确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帝国—empire”的对译，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透明和简单。这也要求史家更加自觉地审视自己的语言和表达习惯。

二、西方学界“中华帝国”逐步取代 “王朝中国”的趋势

（一）王朝作为中国历史的叙事框架

古代中国对自身历史的书写，是以朝代或皇朝为单位的“正史”形式进行的。从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确立了“皇朝史”的编纂方式后，至清乾隆四年，

《明史》修成，又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称二十四史。但清末民初时，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朝代史学，因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无法区分“君史”与“民史”，而受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挑战。^⑩加之“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使用让正史的文言文叙事既不适合读者阅读，也不适合学者写作，“正史”体裁最终从历史写作实践中退出。但以“朝代”框架写作中国历史的做法，却在中西方历史写作中长期存在。在西方学界，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也基本是按照王朝史学来叙述中国历史的。

这方面的著作不少，如费正清在《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将“中华帝国”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等同起来。“中国是中国人自己对祖国的称谓，‘天下’即指‘世界’，常用作‘中华帝国’的别称”。费正清按照大一统“天下”的观念，将中华帝国分为：帝国的初创（秦）——帝国的复兴（隋唐）——帝国的延续与晚期（元明清）。在“中华帝国”框架内，有一系列王朝循环。“在此种循环中，各连续王朝不断重复地演绎着令人烦扰的相同的故事：英雄的创业期，王朝鼎盛期，然后是长期的衰落，直到最后的总崩溃。”王朝循环的积极因素在于“它已经成为指导基本技术、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一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费正清还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元朝、清朝，虽然是“异族征服”的两个王朝，却因为它们“都如出一辙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制度，通过庞大的中国官僚政治来支撑皇帝的集权统治”，因而，能“以帝国合法当权者的角色，无限地统治着人口众多的中央王国”。第二，“中华帝国”在对内对外关系中并非是一种“帝国主义”，传统上中国与其他各国统治者之间的宗主—附庸关系是一种“文化主义”。“这不能算作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相反，它应是一种防御意义上的文化主义。”^⑪

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到中国的“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即“皇朝”循环现象：“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

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帝国的定义也主要是因为“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并“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⑫

出版于1986年的《剑桥中国史》,也是按照中国朝代来划分各卷的。从这套书来看,它倾向于将王朝和帝国并用,而“帝国”专指设立“皇帝”制度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例如《剑桥中国秦汉史》中,“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的最早几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复合词‘皇帝’,大致可以译成英文‘*august emperor*’。……在中文中作为*emperor*的标准同义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而到“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这个形式的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之末”。^⑬《剑桥中国史》的这种分期法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王朝断代史(正史)框架,并成为欧美学术的标准。

就这个时期西方学者理解的历史中国而言,虽然也称“中华帝国”,但其基本意涵是指一个由皇帝统治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其独特之处在于,一是保持连续性发展,二是在对内管理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三是在对外交往中维持文化主义的、而非侵略式的朝贡体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历史中国的理解,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叙事框架。

(二)“帝国”取代“王朝”

大约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中国历史叙事的王朝框架受到挑战,一种新含义的“帝国”概念登上舞台。在西方学界看来,中国历史的王朝框架有其弊端:一是只关注政权的兴衰,却掩盖了潜在的

社会进化趋势;^⑭二是在中国历史并无实际变化时,用王朝更替赋予了某种变化,同时还给予中国历史并不存在的某种连续性。^⑮脱离“王朝”框架的尝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明显,西方学者开始从其他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如伊懋可从社会—经济体系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⑯谢和耐根据政治模式的延续和重大转变,如“宫廷文明”或“贵族城市制度”来认识。^⑰但这些模式因只提供某种基于中国的理解,并无助于将中国历史放置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框架内进行比较而饱受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界开始尝试运用新式的“帝国”概念于中国历史。

1. 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华帝国”与后现代主义批评

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关注“帝国”,是因从欧洲历史经验看,*nation*^⑱对于推动现代化至关重要。而*empire*恰好又是*nation*的前身。例如戴维·赫尔德概括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体系(*state systems*)演进:传统的纳贡帝国、封建主义—分权体系、等级身份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这大约是基于欧洲经验最简洁的总结。^⑲在西方现代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包含了某种前提,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唯一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起源完全是盎格鲁—欧洲的。^⑳显然,现代化理论对“帝国”的关注,是因它可以解释民族国家起源。

当西方现代化理论把历史中国放在这种*empire-nation*的演进框架中寻找“现代性”时,往往侧重于寻找“中华帝国”内部的竞争性关系,即寻找以族群对立关系为基础的*nation*的起源。有国外学者认为,最早在宋代就见到了*nation*的起源。基于“抗金”的民族中心主义把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国家试图将对祖国的忠诚观念向下灌输到农民群体中。但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华帝国”的不同在于,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胜利者能够建立压制国家间竞争的集权政体,结束帝国的分裂,而地方性国家永远无法获得任何持久的主权地位。^㉑因为无法说清历史中国的民族认同究竟是来自依托族群冲突的*nation*,还是来

自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西方学者遂认为中国只有一种相对不成熟和不连贯的民族主义。^②

但也正因现代化理论声称在“中华帝国”内部找到了某种“现代性”,自然也就招致以批评“现代性”为已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华帝国”的文化认同是统治精英意志、权力建构的产物,是根据权力政治建构的。^③中国传统的王朝历史是由与官方利益一致的文人所书写的,历史中国的向心性和亲和性是塑造的,这有助于使帝国制度和朝代合法化。^④二是解构这种文化认同,这在本质上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方法。它或是将“中华帝国”解构为拥有独特经济、方言和文化的各历史区域;或是从领土和认同等出发将“中华帝国”解构为核心区与边缘区。^⑤后现代主义指斥以“现代”中国疆域来看“古代”中国历史,是一种历史后设观察,是将中国的“民族国家”不断往历史深处追溯,“是在时间上不断向前移动的受边域束缚的地理实体”。^⑥

但现代化—后现代视角下对“中华帝国”的观察,却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中华帝国”能始终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当罗马帝国和其他古代或中世纪的帝国最终崩溃时,为什么中华帝国仍然存在?”^⑦

2. 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华帝国”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另一种将“帝国”引入历史中国叙事的是全球史。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史中出现了一种泛化帝国的现象。全球化论者将“古代帝国”与现代资本主义“帝国”泛化等同起来。如德里克认为,与列宁将殖民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殖民主义可以扩大到指“区域”之间的关系,指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nation)或将要成为民族的社会政治控制。^⑧“早期和晚期的帝国都是相似的,它们都以军事力量和征服人民为前提,通过贸易、殖民、采矿、税收和贡品的结合来积累财富。”^⑨全球化论者将世界体系论上推至古代社会和帝国,认为10世纪

至今,长期经济增长建立在通过强大霸权维持的创新、和平和稳定的循环基础上,重要的商业交流和跨国分工创造了早期的经济世界体系。^⑩全球史认为“帝国”不会灭绝。通过复制、进化和改造,帝国“拥有强大的来世,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更加强大”。^⑪在这种泛化的帝国叙事框架下,世界历史就成了一部西欧帝国最终战胜其他帝国的胜利史。^⑫

全球史范式试图通过将历史中国泛化为“帝国”,而实现中国历史的“世界历史化”,这与柯文(Paul Cohen)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的想法完全相反。^⑬基于这种新看法,“历史中国”被视作在“征服、胁迫和战略谋划”基础上建立的“中华帝国”,其“扩张”正是全球进程的一部分。^⑭由此导致对中国各“王朝”的看法,特别是对各强大历史王朝的看法发生改变。这里略举几例。例如“秦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中国的帝王统治者取得的主要功绩——征服、建立和巩固帝国——以及拓展疆域至‘外中国’,即由非中国族裔人居住的遥远的被征服地区”。^⑮对宋的看法为:在11、12世纪,宋朝的中华帝国发展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系统,并从事海洋探险和经济创新。^⑯对元明清三代的看法为:“元帝国”将中国融入了真正的世界体系,为了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中亚和东南亚,并且为了支持这些目标,动员了大量军队和庞大的舰队。“明帝国”则是更大的包括美洲在内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对已知世界的认识的扩大也导致明帝国试图通过利用其海上力量,在这种新的格局中提高自己的地位。“清帝国”则是清朝皇帝建立的一个庞大的、以亚洲为基础的大陆体系,他们试图引导他们的帝国度过危险时期,而中国本土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⑰

全球史对历史中国的泛帝国化,招致了关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包括“中华帝国”在内的诸多帝国都成了其批判的对象。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是帝国权力在促进世界各区域互动

与联系的同时,也给殖民地居民带来了创伤与痛苦。^⑧后殖民主义批判其他非西方“帝国”在历史上也曾殖民,强调“中华帝国”与其他帝国并无两样。“18世纪的世界包括许多殖民地冲突的战场,这些冲突是由从中国到埃塞俄比亚到瑞典和俄罗斯的一系列帝国挑起的。”^⑨

显然,全球史以及后殖民主义泛化帝国的做法,最大的误区是未能在基于军事和政治需求驱动的古代“帝国”,与近现代之后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驱动的现代帝国之间加以区分。对中国历史也颇多错误理解之处。“‘帝国’变得更接近镇压、压榨、歧视、战争、流血,乃是西欧向海上发展以后的事。……这种以此来回溯遥远的历史,还大谈各种故事的态度或行为,是否应该说是近现代的任性自大,或者几乎是缘自欧洲型文明主义的一种诈术呢?”^⑩

总起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中国”在西方学术范式中,已被放在一个以西方“帝国”概念为零点的坐标系中来观察:纵轴的一端是现代化,另一端是后现代;横轴的一端是全球史,另一端是后殖民主义。这造成了一种西方学界各种理论“围观”并“凝视”历史中国的奇景。

三、应以何种视角看待世界历史里的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在关于历史中国的研究中完成了一种从中国“王朝”框架向西方“帝国”范式的转移。对此,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历史中国在世界历史中遭遇的“概念化窘境”;^⑪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在“普世史”的世界历史写作中,作为地区的历史中国遭遇到的偏见。^⑫但综合起来,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学术范式,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中去理解的问题。对此,笔者谈三点看法。

第一,在世界历史中克服西方中心论,不能单纯依靠西方学术范式的自我反思。虽然当下西方学界试图通过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化”,来解决完全依靠欧美历史经验建构世界历史模式所出现的理论偏

差与种种问题,但源自欧洲历史和社会科学经验的学术范式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阻碍了这种认识。^⑬无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理解中国历史,或是让中国历史世界化,都最终成了一种消化中国历史于西方学术范式的学术尝试。从其多种理论范式的实践来看,并不成功。只有对中国历史进行彻底的再研究,寻求超越主要基于西方经验的现有历史分析范畴,才有可能完善和发展当前世界历史模式,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第二,仍需要继续坚持与弘扬中国学界在世界历史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中所一贯提倡的历史事实与因果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研究原则。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探索因果必然性出发,从理解国家、上层建筑的公共职能最终一定要适应其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需要这一因果必然性出发,将欧洲“帝国—民族国家”经验与中国从王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经验,共同容纳于一个具有因果必然性规律的世界历史模式中,才能真正地解决中西方历史概念与范式的不相容问题。

第三,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倘若暂时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范式对接中西方不同学术范式,可以先申明中外概念的差异,并保持不同历史观念的共存。这也是一种客观、务实和科学的态度。这在过去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中有过一定的实践,也体现了编著者对于中外历史发展不同特点的谨慎关注。例如在周一良、吴于廑先生的世界通史中,称亚述、波斯、贵霜、罗马等为帝国,但称呼秦汉则为“秦汉中国”。^⑭又如在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中,也是如此处理。“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绝不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⑮这种“王朝”与“帝国”概念的并用,显然是一种务实与科学的态度。

总之,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使用跨语际的概念时,

史家应谨慎对待其意涵与外延历史经验中的差别,并适当辨析。因为概念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容词式的限定,它还将干涉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选择何种框架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对接,故需慎重对待与思考。

注释:

①Josep M. Colomer, "Empires Versus State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2017. <https://www.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608>[2020-01-04]

②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87页;饶淑莹:《论“帝国”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刘文明:《“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

③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60、2页。

④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中国旅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188页。

⑤刘禾:《跨语际实践》,第368页。

⑥如1978年12月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29-230页。以下题录信息除页码外,均基本相同,不再赘引)、1983年第2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233页),到2005年第5版(第300页)、2012年第6版(第287页)、2016年第7版(第287页),一直坚持这一“帝国”释义及举例未变。1996年第3版(第277页)、2002年第4版(第277页)的“帝国”释义中,在前基本义外,又新加一义:“比喻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但此后版本均删除此义。

⑦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第191-195页。

⑧参见科林斯词典(<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empire>)、剑桥词典(<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empire>)、梅林—韦伯斯特词典(<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empire>)。

⑨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第207-220、226-227、236-237页。

⑩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5页。

⑪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0-71、153、195-196页。

⑫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3页。

⑬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51、98页。

⑭Alice Lyman Miller, "Some Things We Used to Know about China's Past and Present(But Now, Not So Much)", Journal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Vol.16, No.1-2, 2009, pp.41-68.

⑮Angela A. Lee, "Periodization and Historical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ducation About ASIA, Vol.21, No.1, 2016.

⑯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⑰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⑱nation是世界历史中又一个“混乱的概念”,一般译为“民族”或“国民”。这里为避免引起歧义,保持原样不译。

⑲C. Pierson, The Modern State, Routledge, 2004, p.31.

⑳Laura Doyle, "Dialectics in the Longer Durée: The IIPEC Model of Inter-Imperial Economy and Culture", Globalization, Vol.11, No.5, 2014, p.691.

㉑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0, 1993, pp.1-26.

㉒Peter C. Perdue, "A Frontier View Of Chineseness", 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Psychology Press, 2003, p.55.

㉓Nell Renwick and Qing Cao,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Victimhood,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ower", East Asia, Vol.17, No.4, 1999, pp.111-143.

㉔Ja Ian Chang, "Popular Narratives versus Chinese Histor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 Emergent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No.4, 2014, pp.939-964.

㉕Alice Lyman Miller, "Some Things We Used to Know about China's Past and Present(But Now, Not So Much)", pp.41-68.

㉖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㉗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p.7.

㉘Arif Dirlik, "Rethinking 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ation", Interventions, Vol.4, No.3, 2002, pp.428-448.

②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Routledge, 2014, p.9.

③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p.9-10.

④Susan E. Alcock, "The Afterlife of Empires", in Susan E. Alcock, et al.,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70.

⑤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13.

⑥Arif Dirlik,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Modernity: Chinese History between Eurocentric Hegemony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1, No.1, 2007, pp.97-115.

⑦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6-11.

⑧霍华德·斯波德克:《全球通史从公元前500万年至今天》,陈德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页。

⑨Barbara Bush,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pp.9-10.

⑩Charles Homer, Rising China and Its Postmodern Fate: Memories of Empire in a New Global Context,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0, pp.11-12.

⑪张旭鹏:《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⑫Laura Doyle, "Inter-Imperiality: Dialectics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History", p.162.

⑬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第241页。

⑭Luo Xu, "Reconstruct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8, No.3, 2007, pp.325-350.

⑮Xin Fan, "The Making of an Alienated Past: The Study of Ancient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2013.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461435426/abstract/56EDDD9C9AE14361PQ/2\[2020-01-05\]](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461435426/abstract/56EDDD9C9AE14361PQ/2[2020-01-05])

⑯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

⑰周一良、吴于廑主编,齐思和分卷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9页。

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刘祚昌、王觉非分卷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魏孝稷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7)的阶段性成果。

1883年,正值英帝国的扩张达到高潮的时刻,约翰·西利出版了经典著作《英格兰的扩张》,推动了英帝国史研究的出现。^①显然,英帝国史学的产生是英帝国扩张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殖民主义辩护的一种意识形态,激励英国人担负起全球性帝国统治者的责任。^②但是,随着英帝国的解体,英帝国史学也走向了衰落,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帝国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科中最死气沉沉的研究领域。^③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帝国史学受到人类学、生态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从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转向了关注文化、认同、生态环境、性别、种族以及殖民知识,极大地拓展了帝国史的研究空间,使帝国史研究又出现了生机,这种史学思潮被总称为“新帝国史”。^④其中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可谓最大,有学者把用后殖民视角研究帝国史的取向叫作“后殖民转向”。美国学者戴恩·肯尼迪提到,所谓“后殖民转向”意味着历史学“从强调物质力量的解释(如军事对政治的影响或全球贸易体系对财富生产的制约)转向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⑤具体来说,后殖民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是讨论“差异性”话语表述与帝国统治的权力关系;二是被殖民者、有色人种、工农阶级、妇女等帝国底层群体的主体性问题。

一、“差异性”话语与帝国统治的文化权力

尽管在萨义德出版《东方学》之前就有学者讨论

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态的问题,^⑥但是,正是萨义德系统地反思了西方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在萨义德看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统治被征服地区,还受到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强烈的支持和驱使”。^⑦萨义德批判的重点正是西方描述东方而形成的一门学科——“东方学”及其相关的知识。传统上,东方学家和帝国史学者认为,西方人研究东方的语言、历史、艺术、宗教和社会生活,建立了东方学这一门精深的学科,是为了西方人能够准确地认识东方,甚至是为了替东方人保存整理东方的文化。萨义德改变了人们对东方学的看法,他指出,只有把东方学当作一种话语来考察,才能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西方人通过东方学和相关的知识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异域,或者说,制作了一个“东方”,借以获得自身的力量和自我身份。^⑧因此,东方主义话语“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⑨而这种权力的实现依赖东西方“差异性”的话语结构,也就是说,在东方主义的话语结构当中,存在一个本质对立的西方和东方,西方是进步的、民主的、理性的、节制的、男子气概的;东方是落后的、专制的、非理性的、纵欲的、女性气概的。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强弱”“优劣”对立关系构成了西方支配东方的话语秩序。^⑩

在萨义德那里,东方主义话语是互文性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政论、人类学、旅行记、地理学、科学知识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根基——自由主义思想在内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文本相互指涉,构成了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⑪不过,萨义德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作品,所以,一些文学研究者率先将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用于帝国的文学研究。而主流的帝国史学者一开始报以敌视的态度。但是,后殖民理论提供的新颖视角还是吸引了大批支持者。^⑫后殖民理论与历史学的联姻迎来了新的前景。持后殖民立场的学者研究的殖民话语对象大体没有超出萨义德谈到的范

围。但是,出于历史学研究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历史学家往往从殖民话语的不同侧面进行反思,具体包括东方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史、旅行记中的他者形象、科学和医学话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等。^⑬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介绍部分代表性著作。

阿拉伯人出身的萨义德批判的东方学主要是西方人生产的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尽管他的《东方学》也涉及了印度学(Indology),但毕竟略而不详,这给一些学者反思印度学和汉学(Sinology)等其他分支学科提供了思路。1990年,罗纳德·因登出版的《想象的印度》一书就带有强烈的萨义德风格。^⑭他在书中系统分析了启蒙运动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印度学家关于印度的表述。他认为,西方的印度学家用几个本质化的概念来定义印度社会的特征,即种姓制、印度教、乡村血缘社会和专制主义王权,从而把印度想象成一个缺乏个人主义、政治自由、科学等西方特性的落后社会,且没有能力认识自己的落后本性,只有依靠英国人的统治才能获得进步。因此,欧洲的学者与殖民者以及西方的商人阶级依据这种印度学话语进行联合统治。与萨义德不同的是,因登还认为可以利用印度人自己的能动性,比如印度学者的本土研究实现对印度的准确认识。印度裔学者贾韦德·马吉德具体关注了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的几位印度学家,如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等学者,强调他们虽然打造了不同版本的印度形象,比如琼斯的印度形象是正面的、密尔的印度形象非常负面,但是他们生产的有关印度的知识都成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基本教材。^⑮赴美的中国学人顾明栋写出了当今仅有的一本讨论“汉学主义”的专著《汉学主义》来反思汉学,^⑯在书中他承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但主张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在他看来,东方主义或隐或显地为殖民统治铺路,但是在历史上西方从未征服过中国,所以,他提出,汉学主义“是一种西方中

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识论方法论和西方视角指导下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其潜在的逻辑是“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①国内学者也参与了汉学主义的争论,不过,总体上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关注。^②

一些后殖民史学者注意到,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和东方学的作用是一样的,目的是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人类学学科的特点是利用文化、部落、族群、宗教等概念把一个个复杂的整体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单位,因此,对于殖民者来说,人类学的话语有利于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尼古拉斯·德克斯就指出,英国人提出的印度“种姓制度”一方面是为了缔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通过扭曲和简化印度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分裂印度社会以有利于殖民统治。^③贾南德拉·潘迪认为,印度社会中的教派主义和宗教冲突是英国殖民者建构并加以制度化的产物。^④非洲史学者发现非洲殖民地也存在类似的经历,勒罗伊·韦尔等学者发现非洲的部落认同在前殖民时期并不稳定,殖民统治使部落认同强化,这为后来非洲一系列的部落冲突埋下祸根。^⑤

进入19世纪后,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成为建构殖民话语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建构了一套“文明使命”(civilizational mission或civilizing mission)话语,长期构成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著名的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看来,“如果从殖民主义中减去‘文明使命’,殖民主义就根本不存在了”。^⑥乌代·辛格·梅塔论述了自由主义与帝国统治的共谋关系。他在《自由主义和帝国》一书中考察了与英印殖民当局有直接关联的几位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詹姆斯·密尔、托马斯·马考莱和约翰·密尔关于帝国统治的主张,发现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将西方和非西方放在一个“自由”的宏大叙事当中,宣称未进化到“文明”阶段或尚处在“儿童”状态的殖民地人民应该像孩子依赖父母一样受到高级文明的监管。^⑦梅塔进一步指出,自由

主义在这里通过裁判其他民族的经历并借以干涉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将帝国统治合法化的目的。^⑧而珍妮弗·皮茨的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帝国主义者,她认为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边沁都反对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到了詹姆斯·密尔父子那里自由主义发生了一个转向,成为了支持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⑨殖民主义的“科学”话语与“文明使命”话语常常是相伴而生的,吉安·普拉卡什认为,科学文化权威在印度的形成始于19世纪初引入的“文明使命”话语。^⑩很显然,作为一套殖民话语体系,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大卫·阿诺德的研究发现,英国殖民者贬斥印度传统医学,将印度文化与印度次大陆的自然环境同样看作病原体的来源,以此抬高西方医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向印度人宣示“如何将高级文明传播到印度”,^⑪无疑,这种“科学”话语建构的目的是为英国统治打造道德正义性。

当然,后殖民理论虽然启发了许多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还是与纯粹的理论保持了应有的距离,也避免了后殖民理论的某些缺陷。比如,约翰·麦肯齐批评萨义德的理论带有极端的非历史倾向,同样将“西方”本质化,没有考虑到西方知识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⑫托马斯·特劳特曼对萨义德理论的僵化也表示不满,他说东方学不是铁板一块,也不一定与权力相关。特劳特曼梳理了1750年到1900年欧洲学者的梵语研究和雅利安种族研究,认为这些学者大体上分为“崇印派”(Indomania)和“憎印派”(Indophobia),前者包括威廉·琼斯、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后者包括詹姆斯·密尔和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Latham)等学者。^⑬托马斯·梅特卡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研究了英印统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复杂性,总结说“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从来没有呈现出一种单一而连贯的思路,相反,他们用以维持帝国在印度统治的理念与思路总是充斥着矛盾与多变”。同时他也承认,整个英印统治时期,影响统治意识形态最大的仍然是制造“差异”话语。^⑭

二、帝国底层的反抗意识与主体性

萨义德关注的核心议题是“表述”与话语支配的关系。在他笔下,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构成了话语霸权,东方是沉默的,自身无法表述,只能通过西方人来认识自己,他还曾明确地说,“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⑧东方或者帝国底层的人民能否表述自身?他们能否拥有主体性?后殖民理论表现出多元的形态。印度的“底层研究”和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为后殖民批评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成为刺激后殖民史学发展的重要来源。

“底层研究”学派的出现源于一些印度本土的历史学家对精英主义叙事的不满。该学派的旗帜性人物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1982年出版的《底层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纲领性的文章,批评了印度史书写中的两种精英主义倾向:一种是把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化看作是印度精英学习西方和殖民体制的后果;另一种则视为少数英雄反抗殖民统治的伟大业绩。古哈认为,这种叙事有意忽略了“人民的政治”,即以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底层阶级和群体的思想和活动。它与精英政治平行,是一个“自主”领域,它存在于前殖民时期,在殖民时期发展成新的形态。他还指出,印度的精英和底层阶级在民族主义动员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精英的动员墨守成规,采用妥协和非暴力的手段,而底层的动员则更具有暴力性,1919年的反罗拉运动、1924年的曹里曹拉事件、1942年“撤出印度”和1946年的印度皇家海军起义,都表现出与精英政治,特别是甘地及国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同的底层主体性。^⑨在这种“从底层发现历史”的史学理念指导下,“底层研究”学派书写了大量殖民时期印度农民、工人、士兵等底层群体的反抗史,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底层的自主性意识。^⑩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的“底层研究”思潮已经在西方,甚至拉美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⑪

然而,正当“底层研究”在西方获得与日俱增的

影响力时,该学派却转向迎合西方的后殖民思潮,受福柯、萨义德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被取代,他们把研究重点从殖民地底层人民的反抗与“自主性”转向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⑫这也造成“底层研究”学派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公开批评拥抱后殖民理论的底层研究造成“底层”的衰落甚至缺席,又回到他们曾经批判的精英主义史学。^⑬当底层研究与萨义德式的后殖民研究渐趋合流,不再重点关注底层人民的反抗政治时,另一位后殖民理论学者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性理论再次将人们的目光移向底层的主体性与反抗主题。^⑭霍米·巴巴批评萨义德把殖民权力全部看成是殖民者的,忽略被殖民者的反抗策略,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和理论的简单化。^⑮他否定萨义德论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单向的权力关系,认为被殖民者通过“模拟”“混杂化”等策略,表面上模仿殖民者,实际上破坏了殖民权威,瓦解了殖民秩序,表现出主体的抵抗。^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给一些帝国史学者带来新的灵感。

保罗·吉尔乔伊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一书中探讨了黑人的文化混杂和主体性议题,他提到,黑人通过奴隶贸易等形式与白人社会接触,黑人与白人文化产生了文化混杂,出现了霍米·巴巴所说的“中间状态”。因此,黑人形成了“双重意识”,他们一方面捍卫西方的价值,另一方面保持黑人的集体认同,对故乡非洲十分着迷,同时对西方文化展开激烈的批评。^⑰吉尔乔伊通过阐释黑人的主体意识,反思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主张应该把黑人的历史、奴隶制整合到现代性叙事当中,最终颠覆在主导种族和主流话语中流行的中心—边缘关系,从而实现重构现代思想史。^⑱

印度裔女性历史学家杜尔巴·高希关注的是殖民时期印度女性与白人男性的跨文化婚姻现象。她意在回应斯皮瓦克有关“底层能说话吗”的问题,但她不同意斯皮瓦克的否定性答案。高希在殖民地档案、政府文件和家庭遗嘱等历史文献中找到大量与

英国男人结为伴侣或者保持情人关系的女性,发现这些拥有跨文化背景的印度女性策略性地利用混杂身份,比如,使用欧洲人的名字,但用当地语言书写;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要求举行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的丧葬仪式;在她们的家庭中使用欧洲的瓷器和印度的铜器,穿戴本土和欧洲的服装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利益,从而塑造女性的主体性地位。^⑫

一些帝国史学者在研究殖民地的主体性问题时超出种族、女性、底层群体的范围,他们还从后殖民视角考察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深刻影响,甚至提出“去中心化帝国”的命题。^⑬确实,后殖民视角有助于重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重建宗主国与殖民地历史之间的联系。安·劳拉·施拖勒和弗雷德里克·库珀曾精辟地论述过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双向作用。他们指出,“欧洲的殖民地从来都不是可以按照欧洲的形象打造或者为了欧洲的利益而可以随意塑造的空白之地;欧洲的宗主国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实体……欧洲是由它的帝国事业所造就的,正如殖民地是在与欧洲的冲突中发展一样”。^⑭安托瓦内特·伯顿对帝国女性史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她在《历史的重担》一书中分析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如何构建和利用印度女性的刻板印象来支持她们自身解放的努力。^⑮伯顿的研究表明帝国本身也改变了宗主国的政治文化。无疑,重新书写帝国中心与底层或者边缘单向度的关系,转换旧帝国史书写中宗主国向殖民地传播文明的叙事范式,是后殖民史学的一大贡献。

三、后殖民理论衰落后的后殖民史学

萨义德曾告诫说,后殖民理论如果不能继续发展,就可能过早陷入“休止”状态。^⑯事实是,进入21世纪,后殖民理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已经过去,有影响力的作品锐减。而且,它一直遭受来自左右两种力量的批评。右翼学者指责《东方学》包含反西方的倾向。^⑰左翼学者阿吉兹·阿罕默德在20世纪末就批评后殖民理论学者所持的文化决定论和“无限文本主义”存在缺陷,并指出他们看不到西方人的东方主

义偏见本质上不是话语而是资本主义支配的后果。^⑱另一位左翼学者维维克·基伯2013年出版一本集中批评“底层研究”学派的著作《后殖民理论与资本的幽灵》,指出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底层研究”系统地误解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特别是印度的发展史,并警告,他们低估资本主义的能力不但容忍自由资产阶级的霸权,甚至助长了它。^⑲最根本地,后殖民研究不过是象牙塔的学问,严重脱离现实,成为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工具。尤其是,当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新帝国主义”的讨论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时,^⑳作为批评帝国主义的后殖民理论根本无力干涉现实中西方的新帝国主义政策。因此,2007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以“后殖民理论终结了吗”为题举行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后殖民理论面临的挑战。^㉑后殖民理论是否终结的问题仍在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20世纪后期的兴盛,近二十年来后殖民理论明显衰落了。^㉒

后殖民理论虽然已经衰落,但后殖民史学仍然保持着活力。这可以说明后殖民话语分析的方法被历史学家所接受,正像西蒙·基坎蒂(Simon Gikandi)所说的,后殖民理论的“终结”不是意味着“死亡”而是“完成”。^㉓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从1991年开始出版“剑桥帝国和后殖民史”丛书,据其官方网站统计,到现在已经出版108本专著,只有4本是2000年前出版的,其中包含大量运用后殖民方法研究的著作。^㉔最近的后殖民史学研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研究显示出长时段综合性的特征,普拉莫德·纳亚尔考察英国人从16世纪与印度人最初接触到20世纪早期400年的时间里观察、探索、统治印度以及殖民统治末期与印度谈判的几种话语,时间跨度更长,涉及的殖民知识范围更广,几乎运用了所有非虚构的文献资料。^㉕帝国在东亚的扩张成为后殖民史研究的学术热点。乌尔里克·希利曼分析英国在东亚扩张中对迫切认识中国的知识渴望,以及形成的中国知识在英中权力关系中的应用。^㉖陈松川关注第一次鸦片

战争前夕,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英国商人集团在中国收集情报的情况,以及以出版英文报刊的形式与中国政府展开的舆论战,指出他们在舆论战中以发动战争相威胁客观上促成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⑦还有一些学者从殖民地精英的角度探讨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这正是萨义德所忽视的。西奥多·库迪切克探讨19世纪英国本土和帝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大不列颠的历史想象,指出英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宗主国衰落却在殖民地印度获得回响,而印度知识分子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利益改写了自由主义的进步叙事。^⑧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对后殖民话语保持距离的旧帝国史也出现了与新帝国史合流的趋势。比如,帝国史家C.A. 贝利对后殖民史学持保留意见,却写出令后殖民史学者艳羡的著作。^⑨他的《帝国与情报》考察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雇用间谍、记者、博学的幕僚共同组成的情报网络,还谈到殖民当局如何理解和误解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实施统治。毫无疑问,有关情报信息与帝国统治的讨论属于后殖民话语分析的典型话题。^⑩2012年,贝利在另一本书中同样探讨抵抗意识与主体性的关系,认为殖民时期印度受过英式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抵抗殖民统治,还在思考如果成为一个全球共和国(英帝国的变体)的公民,如何获得“美好生活”的问题。^⑪

总之,历史学家将后殖民理论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戴恩·肯尼迪提到,经过二三十年的接触与碰撞,历史学家对后殖民理论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疏离和抵触转变为容忍甚至偏好,后殖民转向使帝国史研究成为历史学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⑫为什么后殖民史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因为后殖民史学揭示了殖民主义除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外的另一种面向,即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为我们揭示西方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动力。而且,后殖民史学“发现”了农民、工人、妇女、有色种族这些底

层沉默者的历史,重构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给予边缘者以主体地位。正因为如此,后殖民学者秉持“去中心化帝国”“地方化欧洲”“把欧洲作为他者”等史学理念,^⑬致力于摒弃欧洲的殖民主义话语来实现学术的非殖民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注释:

①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Macmillan and Co., 1883.

② Dane Kennedy, "Imperial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24, No.3, 1996, p.345.

③ Frederick Cooper,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Ania Loomba, Antoinette Burton, et al., eds.,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Beyond*,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01.

④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Routledge, 2010, p.2.

⑤ Dane Kennedy, "Postcolonialism and History", in Graham Hugg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79.

⑥ Bernard Coh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⑦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⑧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⑨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

⑩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49页。

⑪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30-31页。

⑫ Dane Kennedy, "The Imperial History War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54, No.1, 2015, p.9.

⑬除了这些严肃的知识以外,广告宣传之类的话语也可以是后殖民史学研究的对象。参见 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Routledge, 1995。

⑭ Ronald B. Inden, *Imagining Ind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⑮Javed Majeed, *Ungoverned Imaginings: James Mill'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and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⑯Ming Dong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Routledge, 2013. 中文版参见顾明栋《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⑰顾明栋:《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第20-21页。

⑱顾明栋、周宪主编《“汉学主义”争论集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顾明栋:《汉学主义: 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第19页。

⑲Dirks Nicholas, "Castes of Mind", *Representations*, No.37, 1992, pp.56-78.

⑳Gyanendra Pande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㉑Leroy Vail, ed.,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㉒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

㉓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of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㉔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of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p.191.

㉕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关于“文明使命”话语的研究还可参见 Catherine Hall, *Civiliz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Levin, Michael, J. S. 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Routledge, 2004; Carey A. Watt and Michael Mann, eds., *Civilizing Missions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outh Asia: From Improvement to Development*, Anthem Press, 2011。

㉖Gyan Prakash, *Another Reaso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

㉗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98.

㉘John M. Mackenzie, "Edward Said and the Historians",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 Vol.18, No.1, 1994, pp.9-25.

㉙Thomas R.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关于雅利安人话语与东方主义的关系还可参见 Tony Ballantyne, *Orientalism and Race: Aryan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 Palgrave, 2002。

㉚参见托马斯·R. 梅特卡夫《新编剑桥印度史·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李东云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2页。

㉛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第418页。

㉜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撰的若干问题》, 载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第3-11页。

㉝参见 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Vols. I - V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1989. 代表性专著有 David Hardiman, *Peasant Nationalists of Gujarat: Kheda District, 1917-193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ipesh Chakrabarty, *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 Bengal 1890 to 194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㉞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㉟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㊱Sumit Sarkar, "The Decline of the Subaltern in Subaltern Studies", in Vinayak Chaturvedi, ed.,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Verso, 2000, p.307.

㊲1988年, 古哈和斯皮瓦克从《底层研究》前五卷中选出代表性的若干文章以《底层研究选本》在西方出版, 萨义德为之撰写长序, 显示前期的“底层研究”与后殖民理论虽平行发展却存在认知上的亲近性。参见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㊳参见罗伯特·扬《白色神话: 书写历史与西方》, 赵稀方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201页。

㊴霍米·巴巴除了提出“混杂化”和“模拟”两个独创性的概念之外, 还提出了“矛盾性”“第三空间”“中间状态”等一系列相近的概念。参见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㊵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Verso, 1993.

④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p.45.

⑤ Durba Ghosh, "Decoding the Nameless: Gender, Subjectivity,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ies in Reading the Archives of Colonial India", in Kathleen Wilson, ed., *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66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97–316.

⑥ Durba Ghosh and Dane Kennedy, eds., *Decente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Orient Longman, 2006.

⑦ Ann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

⑧ Antoinette Burton, *Burdens of History: British Feminists, Indian Women, and Imperial Culture, 1865–191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⑨ 参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忠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⑩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425页。

⑪ 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⑫ 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erso, 2013. 基伯的批评引起“底层研究”学派的回应，参见 Rosie Warren, ed., *The Debate on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erso, 2017.

⑬ Vivek Chibber, "The Return of Imperialism to Social 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45, No.3, 2004, pp.427–441;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⑭ Patricia Yaeger, "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 Roundtable with Sunil Agnani, Fernando Coronil, Gaurav Desai, Mamdou Diouf, Simon Gikandi, Susie Tharu, and Jennifer Wenzel",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122, No.3, 2007, pp.633–651.

⑮ 巴加特—肯尼迪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也承认，后殖民理论公认地衰落了。参见 Monika Bhagat-Kennedy, "Nation After World: Rethinking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20, No.3, 2018, pp.335–344.

⑯ Patricia Yaeger, "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 Roundtable with Sunil Agnani, Fernando Coronil, Ganrav Desai, Mamdou Diouf, Simon Gikandi, Susie Tharu, and Jennifer Wenzel", p.635.

⑰ <https://www.palgrave.com/gp/series/13937/2020-03-01>

⑱ Pramod K. Nayar, *Colonial Voices: The Discourses of Empire*, Wiley-Blackwell, 2012.

⑲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⑳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㉑ Theodore Koditschek, *Liber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Nineteenth-Century Visions of a Greater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㉒ 阿西娜·赛利亚图：《帝国的、民族的、殖民的、政治的：英帝国史及其流裔》，第32页。

㉓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㉔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㉕ Dane Kennedy, "Postcolonialism and History", in Graham Hugg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p.467.

㉖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dhika Mohanram, *Imperial White: Race, Diaspor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